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四十周年

纪念周总理倡导文史资料
工作三十周年

尊重历史
前启后之
传统振兴
技术
孙大法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中共枝城市委书记孙大法同志的题词。

借鉴历史
启迪后人
开拓未来
振兴枝城

龔尚玉

中共枝城市委副书记、市长龔尚玉同志的题词。

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把枝城市建设的更美好。

孙复玉

1989年12月19日

政协枝城市委员会主席孙复玉同志的题词。

精誠團結
存真求實
激揚民粹
史為今用

譚朝琳
一九九二

政协枝城市委员会副主席譚朝琳同志的題詞。

枝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审定

主审：谭朝琳

主编：白万贵

编辑：曹礼达

特约编辑：（按姓氏笔划为序）

刘忠武 余子光 肖长勤 杨元洲

郑务本 黎泽高

校对：郑联平 张明卫

目 录

情思悠悠忆苏震	刘 真 (1)
解放战争时期在宜都工作的回忆	仇雨夫 (17)
进军宜都的回忆	唐青山 (22)
奔袭聂家河	李忠信 (22)
我为大军推木船	凌少农 (26)
宜都县群众迎接县长进城	万友旺 (38)
解放时宜都聂家河区政府的活动点滴	李善群 (42)
南下到宜都的历程	邓顺清 (46)
宜都县邮局	孟昭良 (50)
宜都县电报局	袁士江 (55)
宜都县政府电话管理所	陈绪禄 (61)
接管宜都县政府电话管理所	李振亭 (66)
建国前陆城行栈概况	张庆恒 (71)
枝城的行栈业兼及地产品	肖长勤 (74)
宜都同裕茶行始末	李宗麟 (85)
解放前宜都县银行	罗会斌 (99)
人和斋商号发行台票始末	潘炳坤 (108)
刘肇卿首创机器米厂	李裕泰 (111)
吴正之改进织布机	王子观 (116)
	王子观 (118)

宜都亨记轮船航运公司·····	王子观	(121)
省立宜都师范建立的前前后后·····	杜文华	(124)
忆张春霆先生二三事·····	江友孚	(132)
张春霆先生轶事·····	傅纯修	(136)
宜都陆城民众教育馆·····	王子观	(139)
宜都卢园——中山公园·····	王子观	(142)
建国前陆城的划龙船活动·····	林朝新	(145)
戴季陶投江遇救及感恩图报详情·····	肖长勤	(152)
竞选国大代表见闻·····	王佐才	(157)
抗日后期宜都县县长陈宗荣的二三事·····	罗迟烺	(164)
饶光亚修建枝江县城码头记事·····	江荣伯	(168)
郑洞国所部在拖溪·····	毛绪福 谢运林	(171)
《长风周报》始末·····	柳振亚	(177)
万耀煌视察枝城纪实·····	王佐才	(181)
陆城使用“水龙”始末·····	林朝新	(187)
指点枝城话力行·····	周正湘	(192)
旧陆城乞丐面面观·····	王子观	(199)
枝城柑桔生产历史初考·····	冉德森	(207)
章文才教授与枝城柑桔·····	冉德森	(210)
谢家洞石刻简介·····	向长久	(214)
古潮音的召唤		
——游谢家洞漫记·····	张文斌	(219)

情思悠悠忆苏震

刘 真

1925年秋，在官僚、封建势力严密统治下的宜都县城，一个不满12岁的小学生在“毕业后的志愿”这篇作文中奋笔疾书：“我们毕业以后，也必定要有为国家出力的远大的志愿。但是有一种很恶的魔鬼——金钱，它专欺侮我们贫人”。“努力！努力！努力振起我的毅力，打倒金钱魔鬼，去就我的远大的志愿！”这个胸怀大志，独具胆识的小学生，就是我的同窗，挚友和革命的启蒙人之一——苏震。

苏震，本名苏本定，号肖东，啸东，曾用名刘公甫、吕华、苏玉诚，1914年4月15日生于湖北宜都县城（现为枝城市陆城）右司街一个清贫的书香世家里。兄妹五人，他排行第四。

我与苏震是在宜都县立尚实中学附小二年级开始同学的，直至尚实中学初中一年级。这段时期，我们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我家住县城西正街。我早上上学，总要多走一段路去邀他。放学回家到右司街口分手时，还要互相鞠躬而别。有一次，我和苏震不知为了什么发生了仅有的一次争吵，一气之下，两人把小手指伸出勾了一下，表示绝交。事

后我越想越后悔，弄得饭也吃不下去。母亲知道后，鼓励我主动去找苏震取和。我来到学校，望了望苏震，发现他也在望我，于是鼓足勇气跑到他跟前伸出了表示取和的食指。他也连忙伸出食指紧紧勾住我的手指。我激动得哭了。我们的友谊得到恢复，而且更加亲密。

可是，苏震很少到我家来，总是我去找他。每次我去他家，如是他母亲先看见我，就呼唤儿子道：“四呀，外甥哥哥来了。”为什么叫我“外甥哥哥”呢？这是因为我的父亲曾从苏震的父亲读过书，我母亲称苏震的母亲为师娘，后来又拜她为干妈，于是苏震就成了我的“舅爷”。

苏震的父亲叫苏忠才，号佩珊，清末秀才，废科举后，考取官费留日，在日本专攻教育两年，回国后，曾任宜都县立高等小学、尚实中学校长，是宜都新式教育的主要创办人。他以极大的勇气将家里“天地君亲师”等神佛牌位一扫而光，换上自己书写的颇有革新气派的条幅，并把三个从未缠足的女儿率先送进“洋学堂”。这在清末民初的宜都是绝无仅有的。家庭的这种新风气自然影响到童年时代的苏震，使他从小就蔑视旧的传统观念和封建礼教，容易接受新事物和革命思想。

苏震全家的生活主要靠父亲教书来维持。1923年，苏震9岁时，父亲病逝。因家贫无钱安埋，由宜都教育界同仁公葬。尔后，苏震和母亲、小妹一家三口的生活靠已出嫁的几个姐姐接济，境遇凄凉。这样的经济状况使苏震从小就对中国社会贫富悬殊的现象极为不满，对劳动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小学时，有一次他同我郊游走到八字桥，望见农夫耕田，汗珠流下来了都不肯停住时，他感叹地对我说：“我们

坐着吃，不知他们的苦楚，毫不爱惜粮食，那还算什么人呢！”

1925年6月，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宜都。我们怀着满腔怒火，挥舞小旗，高呼口号，与学校师生一起参加了县城的集会游行，声讨日、英帝国主义的暴行。日本帝国主义屡屡欺辱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对苏震刺激很深，以至梦见“我国将与日人宣战……枪炮齐发，血肉横飞，我军奋勇前进，毫不畏死，前仆后继”，“惊醒乃南柯一梦，不知中华胜耶，抑日本胜耶，予以是心不宁者久也！吁！倭奴欺辱我国之至也。凡有血气者，莫不欲食其肉而寝其皮也！”国文教员陈仙舟当即在这篇“梦乡记”的作文上批道：“观是梦，具见爱国之热忱！”

社会的黑暗，帝国主义的欺凌使苏震萌发了改造社会的愿望。他在“毕业后的志愿”这篇小学作文中喊出了“打倒金钱魔鬼”的心声。陈先生在文后批道：“打倒金钱魔鬼去就远大的志愿，足见你的毅力，可是现今世界被此种魔鬼欺侮的不少，可叹！”陈仙舟老师是个贫穷的知识分子，他的心自然与苏震相通。而苏震所说的“金钱魔鬼”，就是地主，资本家对劳苦大众的阶级剥削。他那时还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只能表现出直觉的愤慨和朴素的政治愿望。

苏震童年打倒金钱魔鬼的志愿，从未对我讲过。我一直对他小时不爱到我家来及1927年至1931年我俩分头出外求学期间寒暑假在宜都相遇他对我十分冷淡，感到困惑不解。直到1982年我见到苏夏（苏震的妹妹）保存的苏震小学作文残稿，才解开这个谜。一个贫苦知识分子的孩子怎么会喜欢地主兼资本家的家庭？而当这个孩子立志要打倒金钱魔鬼时，又怎么会喜欢我这个富家子弟呢？当然，我们的友谊在1931年

底又得到恢复，这是在我们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之后。

1927年春，苏震考入宜昌省立第四中学初中部。四中前身是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它在大革命时期被称为“鄂西革命的摇篮”。在这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里，苏震进一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一次上国文课，老师讲了王安石变法的故事。这对苏震触动很大。苏震小时，父亲给他取号“肖东”，意谓要他效法苏东坡。听了老师的讲课，他立即不满意苏东坡了，毅然把“肖东”改为“啸东”。

这时，学校暗地流传的《创造》、《洪水》等国民党查禁的进步刊物引起了苏震的极大兴趣。一有空暇，他就躲在寝室里或僻静处废寝忘食地埋头阅读。书刊中宣扬改造社会，抨击国民党腐朽统治的言论引起他强烈的共鸣。他兴味盎然地对同学说：“天下第一乐事，莫如闭门读禁书。”

1930年冬，苏震初中毕业，因家贫，进入不收膳费的本校高中师范科就读。1931年，四中高中师范科并入宜昌省立乡村师范。在一次反对乡师反动校长、复兴社份子周登云的学潮中，苏震、简化生等5名进步学生被反动当局开除。

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初又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在这国难方殷之时，苏震考入武昌省立师范。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退让、不抵抗的政策，使苏震痛心疾首。在对国家、民族苦难命运的忧思中，他更加迫切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当时，中共武汉特委在武昌省立高级中学、省立师范建

立了一个秘密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组织引导进步师生阅读社会科学书籍，研讨马列主义理论，参加革命活动，并派张忍（张执一，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直接领导。苏震入学后即经在省高读书的初中同学张翮（宜都安福寺人）介绍，参加社会科学研究会。在研究会，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研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科学理论之体系》等书籍，逐步树立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不久，苏震、张翮经张执一介绍先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苏震并担任省师团支部负责人，积极组织省师学生参加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

这时，我在荆省立第八中学就读，在进步教师方西平的影响下，开始萌生共产主义思想，并在“九·一八”事件后参加了荆沙地区的反日爱国运动。1931年冬，寒假期间，我与苏震在宜都重逢。一天，他看了我的日记，上面记载着我和西平先生讨论共产主义的几段话，还有我读了《共产党宣言》后写的赞颂马克思的诗。他如获至宝，眉开眼笑，详尽地向我了解1931年下半年荆沙地区学生运动的情形，他满怀激情地教我唱《国际歌》，向我宣传中共反蒋抗日统一战线政策，鼓励我说：“地主作为一个阶级是要消灭的。地主家庭出身的学生只有背叛自己的家庭，才能走上革命的道路”。我们促膝纵论国家大事，抒发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感到有说不完的心里话。我和苏震中断四年之久的友谊在新的基础上恢复了。寒假结束回校后，我和苏震频频通信。他给我寄来吴玉章在巴黎发行的《中国时报》，美国进步作家伊罗生在上海发行的《中国评论》（英文报纸）和中国反帝大

同盟印发的宣传品，使我大开眼界，大长知识，促使我进一步倾向革命。苏震与方西平老师同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指路人。

1932年10月，中共武汉特委被叛徒出卖，张执一等被捕。在军警的搜捕中，苏震，张翮等闻讯从学校越墙逃脱，可是与组织失去联系。回到宜都后，他们约定张翮去上海找党，苏震在家乡等待消息。同年底，我在八中高中毕业，也回到宜都。1933年暑假期间，我们借县立高等小学教室办了一所补习学校。苏震教国文，我教数学。苏震经常结合国文教学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历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蹂躏、残杀中华同胞的暴行，激励学生立志救国，我们还举行了时事辩论会。具有各种政治倾向的中学生、小学教员和青年店员参加了辩论。辩论常常围绕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是举国团结一致打日本，还是“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主义？是靠人民武装收复东北，还是依靠“国联”？苏震长于辩说，阐明道理，条分缕析，令人信服。辩论总是以右派学生的失败而告终。补习学校在宜都青年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建国后，我与“七七”事变前一年投奔延安的宜都同乡罗兰相遇，当问起她参加革命的经过时，她说：“我是在补习学校受到苏震和你的影响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

1933年初冬，张翮从上海来信，说他在上海找到朋友，谋得一个差事。这是他在上海找到党组织的暗语。苏震顿时欣喜万分，立即前往上海，找到了正在上海正风中学就读，担任中共闸北区委委员的张翮。他先后被分配到闸北、沪西区团委工作。

苏震临走前鼓励我也去上海。他说：“我们不能老当口头革命派呀！应当到上海的产业工人中去锻炼。”在苏震的启发和鼓励下，我决心和他一样到上海去革命。1934年春节后，我以升大学为名来到上海，先找到了在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就读的张楚。他是张颉的堂弟，党的同情分子，是我与苏震、张颉的联系点。一见面，张楚就难过地告诉我苏震前几天被捕的不幸消息。当时苏震带着党的宣传品在法租界被国民党便衣特务抄靶子（搜身）抓住了。他把宣传品撒在马路上与特务对打，一直扭打到法租界巡捕房。因特务没抓住把柄，苏震矢口否认特务的指控。他用我的号名刘公甫报了一个假名，说是来上海求学，在大街上遭到抢劫。巡捕要他交出住址。他的住址是党的机关所在地，怎么能暴露给敌人呢。苏震沉着地把巡捕引到金神父路由意坊张楚的居所。巡捕刚开口盘问张楚，苏震赶忙插进去明显地暗示说：“我叫刘公甫，我是才到你这里来住的。”巡捕气急败坏，对苏震拳打脚踢，并把房东喊来对质。房东否认苏震来过这里。苏震丝毫不屈服帝国主义鹰犬的淫威，他擦去嘴角的血，一口咬定这就是他的住处。张楚说：“后来在巡捕房和法院对证时，我承认他不在我那儿住，但苏震东始终说在我那儿住，忠诚地不交待真实的地方”。苏震顶住敌人的威胁利诱和毒打，始终不改初供，保护了党的机关。法租界当局只好将苏震引渡给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

对苏震的被捕，我十分难过。几天后，张颉和我接上了头。他安慰我说：“干革命，吃官司坐牢是家常便饭，每个革命者都要有精神准备。但反动派杀头坐牢是扑不灭革命的。你看苏震东去‘休息’了，你不是又接替他上班来了

吗？”坐牢是休息，这句话只能出自真正的革命者之口。张翮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深感染了我。

但苏震并没有“休息”。1934年初夏，国民党法庭在抓不到证据的情况下，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将苏震判刑两年六个月，转押至苏州反省院。在反省院，苏震与陈家康等同志组织党的支部，秘密联络难友用各种方式隐蔽地与国民党作斗争。他们用开小会，打瞌睡等方式破坏国民党的“集体训话”，用革命烈士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激励难友坚持革命立场，进行革命气节教育。此外，苏震还利用狱中允许借阅一般社会历史书籍的条件，在铁窗下先后阅读了英国威尔斯的《世界史纲》，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太平天国野史》等几十部书籍。国民党的监狱成了他继续战斗的阵地和学习的课堂。苏震嗜书成癖，手不释卷，加上牢中光线暗淡，结果造成视力严重减退，出狱配了一付深度近视眼镜。

1935年12月，苏震被释放出狱。此时，上海党团组织大部被破坏，张翮也于1934年秋被捕入狱。苏震再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他只好回到宜都。家中为了稳定他，由大姐夫筹措了一点资金在古老背（现枝江县姚亭）开了一家小布庄，让他照料门面。苏震厌烦无聊的商业应酬，对生意十分淡泊。他把大部分时间用来读书，并暗地打听党组织的消息。这时，我在上海加入共青团后因病回到宜都，也与组织失去联系。我俩常在一起议论分析国际国内的政治局势，注视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其时，在北京“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武汉地区的学生运动日益高涨。苏震兴奋地对我说：“革命高潮到来了，我们应当参加学生运动，在学生运动中找